

从逻辑论证到语境分析

——后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

殷杰 马健

(山西大学,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后实证主义的兴起,为历史解释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研究者们从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写作的实际过程出发,改造解释模型,以反基础主义、整体论、实用主义为特征,为因果性或合理性的解释内核注入了新的能量。然而,从史学实践来看,历史现象的理解与解释都需要在一种语境化的历史主义程序中进行,语境敏感性贯穿于建构和评估事件描述的全过程。从历史事实的建构性和语境性切入,语境论历史解释在认知的基础上将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加以融合,以语境分析取代了较为狭隘的语义逻辑和泛化的语用分析,进而为当代历史解释研究超越传统的解释二元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历史解释;覆盖律模型;后实证主义;认知语境;语境论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0.03.009

如果我们坚持自亨普尔以来的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研究思路,将科学解释的理论模型直接移植到历史研究中去,就会面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理解同因果解释不可调和,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独立性等诸多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解释性鸿沟。这种由科学解释模型跨界应用所引发的适用性难题,表征了更深层面的方法论争论,揭示出历史解释所触及的规范性悖论:一方面,历史学是一门经验学科,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历史学无法锚定在自19世纪实证主义运动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科学”概念之上。事实上,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后实证主义转向已经表明,科学并非只有单一模式,科学统一的观念源于一种形而上学预设,科学方法的多元性反而能够更好地辩护科学的经验性。由此,历史解释的研究模式在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范式下得以重塑。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出语境复杂性对历史解释过程的深刻影响,尝试引入一种语境论模式,为历史解释研究提供新的哲学视角。

一、实证主义历史解释的困境

覆盖律模型代表了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解释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历史学界对于该

作者简介:殷杰,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马健,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项目编号:18JJD720004)。

模型的批评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模型自身的问题,如相关性、对称性、认知歧义性、概括和规律的有效性等,这些一般性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讨论同步;二是该模型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这触及了以历史学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本质,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人文学科独立性的强调,是适用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实践的历史学家对亨普尔主义所代表的科学模型坚决拒斥的根源,给历史解释的性质划定了界限。

与人文主义者构筑学科壁垒的思路相悖,亨普尔的野心在于,用覆盖律模型彰显的解释逻辑为“统一科学”的哲学理想扫除障碍,其实质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改造历史学,从而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同样得到确立。然而,覆盖律模型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在历史研究中备受诟病。这一模型追求精确性和形式化,以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为前提进行“演绎论证”,从而以逻辑结构来产出“必然联系”^①,被解释项语句是解释项组合语句(由描述涉及的条件性事实的语句与类规律性语句共同构成)的逻辑后承,其逻辑结构完全基于一阶谓词逻辑^②。这种逻辑主义的思维模式为解释问题的科学理性建构提供了简洁的路径,从而避免导向形而上学必然性,而只需要诉诸逻辑的必然性。但同时,这也为模型的实践应用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导致这一经典解释理论最终难以自洽。研究者们从科学研究和日常经验的角度,对亨普尔诉诸的逻辑必然和解释相关提出大量反例,这些反例从真前提(true premises)出发,也都符合覆盖律模型的形式要求,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演绎推理却完全无效^③。由此,在相关性、对称性和概括的有效性等焦点问题的质疑声中,亨普尔模型因为自身难以排除的逻辑问题而遭到批判和扬弃。

20世纪50年代,奎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深刻批判,使得科学哲学研究者从实证主义的迷梦中惊醒。紧随其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于1962年出版,一种新的、动态—历史的科学观呼之欲出,逻辑实证主义自此衰落,代之而起的逻辑实用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流派和理论,重新构筑了一种后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新的科学观在扬弃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综合二分和还原论教条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的科学与非科学、观察与理论、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事实与规范等截然二分提出根本质疑,同时以观察负载理论、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和不可通约性等特征来重新描绘科学的蓝图^④。这对于打破实证主义的科学幻象极为有益,但对于历史解释这种由亨普尔主义所激发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思却产生了正反两面的影响。

一方面,后实证主义对于传统科学观的解构,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消解提供了论据,进而为后现代主义抵制所谓“科学主义”的跨学科殖民提供了依据。后现代主义作为对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经验主义(modernist empiricism)^⑤的反叛,通常将后实证主义对科学观的改造放大成为一种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把历史视为一种文本与话语的语言游戏,并且与自然科学不可通约。在他们看来,历史解释与科学客观性等概念一样,需要被超越。以文本的不透明性以及意识形态

①William A. Gorton. *Karl Popper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 42.

②S. Psillos. “Past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Explanation,” in T. A. F. Kuipers, ed.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cal Issues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sterdam: Elsevier B. V., 2007, p. 124.

③由于我们主要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对分析性的理解来审视解释模型的认识论预设,此处不再赘述覆盖律模型的各种反例的具体论点,相关反例可参见 Wesley C. Salmon. *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pp. 46-50.

④John H. Zammito.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 Post—Positivism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from Quine to Latou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6-14, 271-276.

⑤Mark Bevir. “Contextualism: From Modernist Method to Post—analytic Historic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3, no. 3 (2009), p. 213.

等话语的普遍渗透为理路,后现代史学摒弃了史学客观性、真理性和规范性的认识论基础,其对于历史事实的把握是以阐释而非解释的步骤来进行,历史解释在这种文本主义的术语体系中被遗忘了。

另一方面,后实证主义对于逻辑主义的扬弃,为历史解释研究超越基础主义和还原论的理论模式,进而以一种更加整体论的方式从实践和经验层面考察历史事件提供了启迪。后现代主义和叙述主义者指责那些争论历史解释问题的人们未能把握历史写作的真正本质,对于历史语言只有朴素的认知而缺乏对于历史叙述的复杂本质的认识。这种批判虽然有很多偏颇,但确实为历史解释研究指明了困境,覆盖律模型的辩护者们倾向于逻辑主义的静态观察,缺乏对于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之间如何联结的一种动态的、生成的认识,而行动解释尽管看到了历史主体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地位,但却将历史研究视为一些散乱的、缺乏互动的个人行动的考察,而没有一种对于历史事件、过程的整体把握。后实证主义者接受了从奎因、库恩那里继承而来的整体论思维模式,能够在“信念之网”“共同体”中把握历史事件,从而为历史解释与史学实践的契合提供了路径。

此外,后实证主义对于经验主义教条的批判,将传统分析哲学所预设的分析真理的形而上学必然性消解了^①,这使得历史主义的回归得以可能。分析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源自现代主义者对历史主义的反叛,这种现代主义随着后分析哲学的兴起而被批判和拒斥^②。尽管在后现代主义之后(post-postmodernism)的理论视域中,学界对于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复兴历史主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对语言和知识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对行为意向本质的研究,以及对叙述的兴趣,都为历史主义的主题打开了分析哲学的大门”^③。随着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将科学的历史性和科学观念的形成过程视为理解科学的关键所在,历史主义对于历史性的强调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世界必不可少的视角,历史解释研究也应该适应这一点。

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模式重构

20世纪70年代以降,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历史解释研究的断裂,覆盖律模型的适用性难题所导致的历史解释性质之争,似乎已经无疾而终。随着争论的深入,历史解释的问题域渐趋萎缩,调和覆盖律模型和合理性行动解释之间差异的努力使得争论本身被弱化了,而丹图(Arthur C. Danto)等人将叙述与历史解释相结合的讨论也并没有为该问题适应叙述主义的范式转换产生实质性影响,有些研究者直言,历史解释的主题已经被耗尽了^④。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随同哲学兴趣的转移而消解,相反,这一问题的停滞源于一种研究思路的局限和对问题本身的教条化理解。就此而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反而为历史解释研究开启了新的方向。在这一部分,我们从后实证主义历史解释的几种代表性路径来展开,进而表明,从对于被解释项的描述性和语境性特征入手,我们能够为历史解释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可能性。

(一) 代表性路径

后实证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亨普尔经典解释模型的窠臼,以“语言学转向”和历史主义原

^①Cory Juhl and Eric Loomis. *Analyti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79-187.

^②Mark Bevir and Naomi Choi. "Anglophone Historicism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9, no. 3 (2015), pp. 327-346.

^③Mark Bevir and Naomi Choi. "Anglophone Historicism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9, no. 3 (2015), p. 329.

^④H. Paul. "Why Did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Disappear? Three Narratives of Decline," in K. Brzeze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Leiden/Boston: Brill/Rodopi, 2018, p. 28.

则为新的理论生长点,注重从历史研究的实践和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入手,构建新的解释理论。我们简要考察其中两种理论形态。

1. 信念和行动的弱意向论解释

在批评剑桥学派的语境论思想史解释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对观念史的逻辑进行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弱意向论的信念解释模式,将其扩展至行动解释^①。与剑桥学派主要关注历史文本的语义意义(semantic meaning)和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不同,贝维尔从诠释意义(hermeneutic meaning)与前两种意义的区别之处来重新考察我们对于文本的阐释^②。语义意义和语言意义来自句子和语言本身,诠释意义则来源于作者个人在特定时空中表达的意向,这种意向论不同于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强意向论,并不强调作者意向能够直接决定文本意义,意向的时机性(occasionality)和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对文本和信念的研究只能采取弱意向论^③。进而,信念解释应该将与信念相关的其他信念作为“一致性网络”加以重构。这种观点与奎因知识的信念之网相似,主张将信念本身置于该信念网络中才能获得相关解释。而信念之网又可以置于相关的传统中来获得解释,旧的信念之网由于遭遇困境也会转变为新的信念网络。这种信念解释从弱意向开始,并不预设先验的语境,不会导致发现的逻辑,从而超越了斯金纳式的历史语境论^④。

同理,贝维尔在他对于“扭曲信念(distorted beliefs)”的解释中,将弱意向论扩展为一种行动解释的图式。这种图式将非理性和理性的信念一并视为由支持性态度(pro-attitudes)所激发,而信念和支持性态度通过条件与意志联结(conditional and volitional connections)影响了行动。由于条件和意志联结不同于因果必然或逻辑必然的联结,因此,弱意向论为民间心理学式的行动解释提供了新的辩护模式^⑤。

2. 基于证据和信息因果链传递的历史解释

塔克尔(Aviezer Tucker)的历史解释建立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历史解释只是关于事件描述的解释,而“事件描述的最佳解释是作为证据的最佳解释而确定的”^⑥。柯林伍德曾经将历史学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既往的、已经无法观察到的事件,所以,要依靠“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⑦。塔克尔依据贝叶斯概率理论和德雷斯克(Fred Dretske)的认识论信息理论(information-theory of epistemology),明确指出,科学的历史编纂学就是要从证据出发,通过推断出联结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的“信息因果链”而得出关于原因的信息,此类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都可以在概率上得到分析,由此贝叶斯主义就能够提供历史学家实践的最佳阐释^⑧。

塔克尔认为覆盖律模型在历史编纂学中不成立,事件描述的解释是一些原子解释(atomic expla-

①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6-317.

②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2-53.

③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2-75.

④Mark Bevir. "The Role of Context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Human Studies*, vol. 23, no. 4 (2000), pp. 400-408.

⑤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8-308.

⑥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7.

⑦[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⑧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2-140.

nation) ,它们是对一系列证据的最佳解释 ,只与信息、证据相关 ,而不需要进一步诉诸普遍规律 ,因此 ,这种解释排斥亨普尔主义。塔克尔将历史编纂学拆分为证据、假设和关于信息从事件到证据传递的理论 ,事件描述的解释不同于事件的解释 ,它只解释证据 ,而传统解释理论所强调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联 ,并不属于这种解释的考察范围。接受这种解释 ,意味着不再进行所谓的事件解释 ,只考虑证据和事件描述 ,同时 ,也无须再考虑联结解释项和被解释项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这就把事件解释的核心论题也消解了。塔克尔将这种解释研究模式视为“哲学上的格式塔转换”^① ,一方面 ,它解决了亨普尔主义的解释等同于预测这一对称性难题 ,因为被预测的东西只是证据和信息的传递而非被解释项;另一方面 ,它也解决了单一因果解释的问题 ,由于事件描述的解释取决于对事实证据的解释 ,单一因果解释可以被证据确证 ,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结不需要再求助于问题百出的覆盖律理论。此外 ,这种事件描述的解释理论 ,还有助于将解释性历史编纂学命题与描述性命题在认识论上的二分消解 ,因为事件描述的原子解释的特性取决于外部语境 ,同一命题随着语境的切换 ,可能充当描述性和解释性的不同角色。但这种语用考虑并不影响解释的辩护 ,解释的合法性只依赖于证据和背景信息理论。

(二) 特征分析

由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解释模式可以看出 ,首先 ,后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延续了合理性、覆盖律等第一阶段的争论 ,并且对这些论题做出完全不同的回应。贝维尔的历史解释主要围绕信念如何经由“信念网络”“传统”和“困境”来解释 ,而在行动解释方面践行了民间心理学的解释原则 ,以支持性态度与行动之间的条件联结和意志联结 ,这种更为松散的关系 ,取代了强调“理由即原因”的强因果联系。塔克尔的主张更具颠覆性 ,他将对于证据和背景信息的强调用于解释属性的刻画上 ,不同于事件解释所预设的解释项到被解释项的推理结构 ,事件描述的原子解释只是对于证据的解释 ,并不涉及事件 ,证据所提供的信息因果链才是原子解释的核心 ,这是一种新的因果关系 ,颠覆了亨普尔覆盖律模型对于单一因果联系的依赖。

其次 ,后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明确反对基础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倾向于从后库恩主义的科学观出发 ,以语义整体论原则重构解释的论域。贝维尔明确将自己的反基础主义立场定位于后分析而非后现代传统中。在对于剑桥学派历史语境论的批判方面 ,贝维尔指责这种研究将“研究话语的语言语境”扩展到了认识论层面 ,导致思想史中语言语境的研究成为理解的前提条件 ,也是历史知识确证的一个先决条件^②。贝维尔拒斥发现的逻辑 ,反对将语境研究作为政治思想史中信念解释的先验理论。他明确接受一种后分析哲学的理论立场 ,在拒斥任何“所予”观念和自明真理的基础上 ,观念史的逻辑“不存在给定的真理 ,没有可靠的基础 ,不存在纯粹的观察或经验真理 ,知识是一个单独的整体”^③。塔克尔将观察渗透理论和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讨论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认为历史事件的描述与科学理论中对于电子、黑洞等的描述一样 ,是具有相关理论渗透的;历史研究中证据不充分所导致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 ,并不会导致一种不确定性 ,相反 ,证据能够排除掉大多数错误假设 ,这样就把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相对主义拒斥了。塔克尔以证据与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提出事件描述的原子解释只依赖证据所呈现的信息因果链 ,而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解释规则 ,这就把解释

①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1.

② Mark Bevir. “The Role of Context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 *Human Studies* ,vol. 23 ,no. 4(2000) ,pp. 398-400.

③ Admir Skodo.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3 ,no. 3 (2009) ,p. 314.

的研究只是限定在事件描述和证据的经验层面。

再次,后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把解释的规范性锚定在学科实践之上,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实践的强调,为历史解释理论提供了一种自反性的考虑。在历史解释第一阶段的争论中,亨普尔主义从科学方法的统一来建构解释模型,认为历史解释只有采取覆盖律模型的形式才能获得规范性基础。塔克尔完全拒斥这种解释研究思路,从历史编纂学的实际出发,将证据作为解释的基础,不再寻求任何外在于证据的规范性来源。而贝维尔从观念史研究中的民间心理学视角出发,将信念和行动解释与支持性态度之间的联系,定位于一种更为松散的模式,意志联结和条件联结都不具有因果决定性。这些解释研究都来源于史学实践,也都可以在实际的解释活动中加以检验和修正,这明显不同于以逻辑形式为核心建构的解释类型。

(三) 语境突现

后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并没有真正解决历史解释的“科学地位和逻辑形式”^①问题,毋宁说,这些模型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截取了某些特征,如证据或民间心理学,进而将历史解释建构为与自然科学解释并列、自身具有规范性的解释类型。塔克尔基于贝叶斯主义和信息因果链理论,对于历史研究中考察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让解释与证据关联,而非依赖于普遍规律。但这种基于证据的历史解释与基于普遍规律的历史解释,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只是将证据的规则视为解释的逻辑形式,同时,将解释严格限定在考察证据的工作中,这种限定使我们远离对于事件性质的争论,而只是在证据的辨析中澄清事件的描述性部分,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回答事件究竟为什么发生的。证据确实能对事件描述的真伪做出判断,这是解释的基础,但不是解释本身。贝维尔从民间心理学的术语出发,将历史解释限定于信念和行动同支持性态度之间如何联结,通过赋予各种类型的信念以一种规范性的解释策略,为信念解释构造了完整的心理图景。尽管这种更为精致的行动解释刻画能为我们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行动图式,但是思想与行动的关联并不足以刻画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非常复杂的行动集合,当涉及诸如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这些更为宏大的事件时,解释不能单从心理层面来呈现。要言之,限于其研究视角,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后实证主义历史解释理论,各自延续或改造了历史解释中因果性与意向性两大传统,为历史解释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建构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它们都只是考察到历史事件某一方面的经验内容,事件作为整体,应该按照历史主义的原则,置于其历史语境的整个过程中加以考察。

事实上,当代科学哲学中因果语境论(Causal Contextualism)对于因果关系多元决定(causal overdetermination)难题的克服^②,以及心灵哲学中合理性语境论(Rational Contextualism)对于行动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改造^③,都启示我们将历史解释的传统方法论——因果性或合理性,置于语境论的框架下重新审视,而语境因素的重要性也在历史解释研究中愈发突现。因果语境论主张,“一个单一的因果声明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而具有不同的真值”^④,因果声明的真实性随我们的评估语境而改变,它的语境敏感性是相对于事件描述的差异而非因果场景(causal scenario)的差异而产生,语境可

^①Paul Roth. "Analy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Origins, Eclipse and Revival,"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37, no. 2 (2016), p. 369.

^②Esteban Céspedes. *Causal Overdetermination and Contextualism*, Dordrecht: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12-15.

^③Karsten R. Stueber. *Rediscovering empathy: agency folk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p. 80-97.

^④Esteban Céspedes. *Causal Overdetermination and Contextualism*, Dordrecht: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 13.

以被理解作为一种认知可能性集合,这种可能性帮助我们理解差异性和冲突性因果关系说明的共同基础。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正确运用都需要基于语境评估。合理性语境论则认为,“关于某一特定行动合理性的判断……是根据各种相关的规范性标准、行动者的目标和信念体系、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的资源和能力来评估行动者的语境化判断”^①。行动者的行动是基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合理性来综合考察的,这种评估过程依赖于从环境到人类心智内部组织等各方面的语境因素。

由此可见,历史解释实践中因果关系和合理性原则的使用和评估是语境敏感的,后实证主义历史解释理论由于对解释的语境敏感性缺乏认识,使得这些解释理论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语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各种背景信息,而且会影响解释的整个过程。对于语境的充分考察,有助于我们在各种相关因素的关系网络中,呈现历史事件的特殊位置,这是后实证主义哲学中“整体论”与语境论之间的契合之处。此外,从史学实践来看,文本与语境、行动与语境以及解释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已经构成了一种“语境复杂性”(contextual complexity)^②的解释难题,这种复杂性始终是历史解释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历史解释的语境化发展

在亨普尔主义的研究路径中,解释的逻辑形式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考虑被强加于历史解释过程,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以何种方式相关联是解释的核心所在。但是,这种完全形式化、理想化的模型忽略了历史解释对象的特殊性。无论我们将历史解释的对象设定为过去的人类行动抑或事件,这些解释对象都已经在时间上结束,不可重复,也无法被观察,而只是存在于一系列的遗迹和文献的记载中。也就是说,解释的对象并非一个简单的术语“被解释项”能够指代清楚,它是在描述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对一个现象的解释必须与对此现象的描述关联起来”,“除非我们明确地给出描述,或者除非它的预期描述是从语境中隐含的,否则任何解释指定的现象的要求都毫无意义”^③。从解释对象的描述性和语境性而非解释的逻辑形式入手,能够澄清历史解释中“我们究竟能解释什么”的问题。

过去的事件是经由描述来呈现的,我们对于战争、革命、制度变迁和皇权更替等各种历史现象的分类、描绘和识别,是对于事件及其过程进行把握的基础。在描述性建构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往往需要将自己采用的事件描述与共同体内研究者公认的事件“原型”进行比较,但由于历史学语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语言,其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表达,而“原型”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同体的约定或既往经典文本中被接受的图景,这就导致了描述通常与原型不符。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历史研究中,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还原事件描述的语境,“‘语境’的概念可以有效地用于减轻历史指称对象的难以捉摸可能会导致的怀疑主义倾向”^④。可见,事件描述及其评估是强烈依赖于语境的,通过这种影响,语境又可以影响和限制对于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这种观点也反驳了塔克尔对于证据与事件描述之间关系看法,塔克尔似乎认为,充分的证据考察和比较就能让人们建立起对于事件描述的解释,但他对于描述的语境敏感性缺乏认识,忽略了研究者从同样的证据得出不同描述所反映出的认知状态(cognitive status)复杂性。

^①Karsten R. Stueber. *Rediscovering empathy: agency folk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 83.

^②Esther Eidinow.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Religion Brain & Behavior*, vol. 2018, p. 17.

^③Arthur C. Danto.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18.

^④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6.

此外,事件描述所依赖的语境不只是史料、证据和遗迹等物质性存在,同时,也包括业已形成的共同体内关于事件的具体细节和过程的识别,这些语境本身是生成的、动态的,事件描述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成的、变化的。由此,“一种适当的描述,无论是关于只能借由档案、纪念碑、残骸等方式予以辨认的某一发生于过去的事情,抑或关于此事与语境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些描述常会采用被假定存在于事物——正在发生变化,且其所处的语境本身也在持续变化中——之间的所有关系形式”^①,对事件描述的建构性和语境性的分析,需要把握这种关系形式的可能性变化。因此,语境论通过强调,语境敏感性贯穿于建构和评估事件描述的全过程,且语境只有相对的确定性,避免了传统史学从纯粹的描述出发去建构历史事实,再对事实展开解释的基础主义理想。

再者,由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是在语境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和评估,而历史事件和行动都是在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s)所整合的各种语境参数下得以说明,相应地,历史解释的过程表征为一种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程序。逻辑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型过于强调推理过程的形式规范性,忽视了历史事件和行动的描述在解释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将描述性与解释性命题在认知(epistemic)上加以区分,本来就是经验科学知识建构的前提,这一点与强调观察渗透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并不冲突,但强调纯粹客观、中立、无偏见的描述,在历史研究甚至在大多数经验科学中很难实现,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语境敏感性成了评估描述性历史文本的关键。此外,由于历史主体的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各种层次的历史事件,其产生过程和影响因素都充满了语境复杂性,背景性的情境语境、主体能动性的心理语境、关系网络中的互动语境都需要在一种更为整体性、开放性的、生成的社会认知模式下,才能突现为一种认知语境,进而对行动本身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行动和事件的描述内在地依赖于对各种层次语境的把握。要言之,历史解释对象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揭示各种关系性语境如何塑造认知语境进而影响事件进程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解释,将描述性的文本解读与认知语境的行动解释都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是基于认知过程的语境分析,而且,由于突出了对语境敏感性的考虑,这种解释本身具有一种自反性特质。与强调逻辑—语义分析的静态解释不同,语境论历史解释的结构是随着语境的层次性和动态性而不断调整的,因而体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结构。

总体来看,自库恩以来,科学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科学概念和科学实践需要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建构与把握,静态的、分析的、科学的科学观被动态的、语境的科学观所取代。此外,统一科学的理想也伴随着单一科学观的崩溃而覆灭,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概念的建构性特征揭示出来。这些充分表明,科学并非只有单一模式,逻辑实证主义统一科学的观念,其实源于一种科学主义所衍生出的形而上学预设。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的本质决定了科学是具体的、经验的,因而是语境相关的。由此,当代历史研究能够从后实证主义中引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以这种历史主义为基础,历史解释只能从历史学家的实践中加以透视,而这种实践是语境论的。对于复杂而多元的语境要素进行分析,需要将行动解释的语境和文本解读的语境,都整合在事件分析的语境之中,这种整体论的语境分析过程能够为历史解释提供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张利文)

^①Hayden White. "Contextualis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 1 (2010), p. 2-3.